言。”先秦儒家将天命与人性贯通,依天命而行乃修性之道,“大人”“圣人”“大丈夫”都是儒家修身以求德高品正的人格典范,“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君子则须有此三畏并据以自省。先秦儒家的自省意识还常与“戒”“毋”相关,这是从反面划出的自省界限。孔子讲君子要有三戒:少年时戒色,壮年时戒斗,老年时戒得。《论语·子罕》载孔子戒绝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悬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在交友方面,孔子主张“毋友不如己者”,因朋友分损益二类,益友有三:“友直、友谅、友多闻”;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论语·季氏》)。

尽管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往往同“耻”“畏”“戒”“毋”等字词相关,但它并不悲观消沉,是乐感的而不是罪感的。李泽厚先生早就提出过儒家文化“乐感说”,先秦儒家严苛自省,但在省察中提升自己,修身近仁,为圣成贤,体验的正是一种道德心理的愉悦感。美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研究《论语》中的自我问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论语》中的自我是自省的个体,但与西方宗教文化中普遍认识到的个体自我担负着“原罪”的痛苦,渴望得到上帝的救赎不同,“孔子好像是一位肯定论者。他的语言和意象一般都是积极的、肯定的、健动的”[6]106。

(四)人文性

在一定意义上,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同宗教忏悔一样都是一种内在超越,李泽厚先生曾肯定“三省吾身”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即宗教性道德的追求色调;认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就是宗教性人生境界[8]。但实际上二者的区别又是非常明显的,儒家不是像宗教那样到感性的个体生存或神秘的宇宙主宰那里寻求解脱,而是在人与社会的联系之中确立自我,通过心理与天理的交流、良心良知的存养省察来实现肉体的超越、灵魂的不朽,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儒家自省意识的人文性突出表现在通过深沉自省,执着追求完善人格、道德境界之上。先秦儒家的自省也常与“天”“天命”“道”等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但在儒家那里“天命”不是虚幻神秘的。朱熹论道:“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天命可谓是儒家的“道”,而作为道德本体的“仁”即“道”,仁既是国家兴废存亡的关键,又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本。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先秦儒家自省在道德上的终极追求即是仁,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载“闻道反己,修身者也……修身近至仁”,率道而行,端然正己,才是君子。在人格典范上,《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君子”,孟子赋予“大人”以道德内涵,更响亮地提出了气有浩然的“大丈夫”人格,荀子则划分出了士—君子—圣人这一人格晋级的“三阶段论”,这些理想人格典范具有一种神奇非凡如同磁性一般的引力,使儒学思想家们面向圆满的人性激发出为学修身、层层内省的决心和毅力。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对自我进行了等级区分,在“本我”“自我”的基础上,提出了作为自我典范的“超我”。“超我”代表着人的高级本性,是超越的、理想化的,“超我”与“自我”之间的悬殊差别往往使个体产生谦卑感,促使对自己进行道德稽查,并积极做出自我控制、自我提升的努力。

孔子所设想的不是负责任的、理性的道德行为者作出一种不可化约的原初的选择,而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典范——过着最高尚的人性的生活方式,这种人格典范对那些具有潜质的人散发出一种完全非强迫但却富于强大吸引力的力量,继而,那些具有潜质的人受到典范的鼓舞,从而能够作出一种真诚的努力,通过掌握典范的生活方式并以这种方式艺术地生活,去学习参与到那种典范的生活方式之中[6]94。

“仁”的道德本体、圣人君子的典范人格,都让儒学思想家们产生一种使命感,对它们坚信不疑执着以求,自身与道德本体、典范人格的落差使他们深刻地自反自省。“任何有使命感的人都会听到内心另一个声音:他受到呼唤”[9]171。

四、先秦儒家自省意识的价值意义

先秦儒家的自省意识由《论语》开端，经《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等文献的进一步阐发和充实，成为先秦儒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与先秦儒家的其他理论思想相互渗透，又具有自身特定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

（一）界分君子小人

君子与小人是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格属性，君子是思想家们为学修身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境界，小人则反是，成为儒家道德批判的众矢之的。先秦儒家从多方面论及君子小人，能否做到和善于自省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道分水岭。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遇到问题时，君子善于自省，从自身找原因，而小人则只怪罪别人而不知省察自己。孔子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回答樊迟关于"修慝"的疑问时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论语·颜渊》）"慝"是藏匿于心中之恶，这里的"其"即是"己"，专于治己而不责人，则自身之恶无所藏匿。孟子对此以耕田为喻："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曰："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荀子·荣辱》）由此可见君子与小人面对问题过失时截然不同的反应。此外，君子自省往往与耻、畏相联系，要有敬畏之心、羞耻之心，小人在这方面也表现得完全不同。君子心怀畏惧而行己有止，小人无畏惧之心则肆意妄为；君子行己有耻，小人"无耻之耻，无耻矣"。最后在外物与利益上，先秦儒家把仁义忠信视为"天爵"，把公卿大夫称作"人爵"，修身是本，外物为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也。"（《荀子·修身》）

（二）人己忠恕之道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恰当处理好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建立和谐融洽的人己关系是儒家道德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儒家很注重在人际交往中自省，见贤思齐，希冀己有是善；见不贤而内自省，恐己亦有是恶；自觉地以人为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时先秦儒家也注重以自省来处理好人己关系。首先要善于以人为镜，根据他人的反应来省己之过。孟子讲：君子以仁统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有礼者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在交往中，如果他人对我蛮横无理，君子则应反躬自问，是否自己不仁无礼、不敬不忠？这种自我检讨、自查自纠的确有助于改善人己关系，但这种自省也是有限度的。孟子讲，如果经过再三反省，自己并不存在以上问题，他人仍待我以横逆，那么责任就不在我而在对方了。"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离娄下）与此类似，君子自省应注重来自良师益友的评价和反应，而非来自群小之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孟子·尽心下》）

反省人己关系，先秦儒家明确主张换位思考的立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定义"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自己的话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省意识和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道德准则。从正面讲，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人先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对于从政者，"政者，正也"，君王身正则天下归之，"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孟子·万章上》）从反面讲，自己做不到的也不能要求别人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较之上一层意思，更加突出了他人优先原则，主体意识进一步降低，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

(三)唤醒当代自省

先秦儒家的自省意识是儒家自省学说的源头,后经汉唐,到两宋明清时期迎来了儒家自省的思想高峰。孔子不太认同的"静思"之法在朱熹那里得到重视,孔子希望看到的"见过而内自讼"在刘宗周那里得到践行并具有强烈的仪式感,"立日谱""儒门功过格"等自省方式的创新和流行,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儒家的自省思想,在《朱子家训》《曾国藩日记》等为代表的古代儒生的书札日谱、诗文学案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儒家自省文献和自省思想[10]。自省意识是人类共有的,它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举例来讲,有朝鲜古代文人暗引"三省吾身"之典取自己斋号为"省吾斋",友人姜世晃(1713—1791)为之作《省吾斋序》,紧扣自省与进阶的主题:

> 曾子曰:"日三省吾身",此乃学者最切要之工也。凡今之人,类多评论人之长短、歆羡人之富贵、营财贿之多寡、较荣利之得失,何尝有自省吾身以无负曾子之训耶?[11]

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省思想也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从国人的道德现状出发,当代自省意识亟待唤醒。首先,要自觉恢复和重建对崇高的向往与追求。古人崇尚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而今天不少人信仰缺失,在道德追求上茫然无主。我们再也不能亵渎崇高、污名化道德楷模了,相反应理直气壮地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崇高的道德风尚。国人通过自省找到与核心价值观、道德标准、道德楷模的差距,才会觉醒,才有动力去修身进德。其次,国人自省应该学习古代儒家的心性修养工夫,见贤思齐,闻过则喜,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使自己被自我所认可悦纳,这样有助于缓解当代人的焦虑浮躁,甚至抑郁厌世。再次,以自省意识处理人己关系无疑会使社会更加和谐。古人与今人都可谓"重己",古人重的是修己、反己,而今人则重私己、利己,自省意识要求今人从速改正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痼疾,向古代儒家学习忠恕之道,让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使社会充满善意与温情。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更多被人机对话所取代,在网络空间人们以虚拟身份发声交往,似乎又到了古人所说的幽暗隐微之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应慎独省察、依道而行,这正是儒家工夫论的独家法门。当前中国道德建设提出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毫无疑问的是,唤醒当代人的自省意识,做到慎独慎微应是私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面对日益尖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多重关系问题,像先秦儒家那样反求诸己、自反自讼显得尤为迫切。如果今天的人们都依据自己的良知和良心深刻自省,在心理和德行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相信国人的整体道德状况会得到不断的改善和提升。在此意义上,先秦儒家自省意识为唤醒当代人的自省意识,推进当代私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16卷[M].2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497.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王天海.荀子校释: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9.
[5] 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36.
[6] 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M].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7]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个体心理学[M].储昭华,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340.
[8] 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5-36,349.
[9]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人格的发展[M].陈俊松,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10] 董兴杰.近年儒家自省意识研究的进展与缺陷[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4-19.

[11] 王国彪.《论语》与朝鲜古代文人的室名斋号[J].孔学堂,2018(2):97-103.

(责任编辑 吴 姣)

The Only Way to Learn for Yourself

——A Study of the Self-examin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onfucians in the Pre-Qin Period

DONG Xing-jie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Abstract: Confucianism is the study of self-cultivation. From the son of heaven to the common people, self-cultivation is the basis of self-cultivation, so self-examination is the only way for Confucianism to learn self-cultivation. The self-examin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Confucian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elf-examination theory of the Confucians. Confucius and seventy disciples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all had specific self-examination thoughts. Confucius' self-examination and self litigation, Mencius' self reflection and self-examination, Xunzi's self-examination and self-awareness are the classic expression of the Confucians' self-examination thoughts, which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Confucians in such important aspects as introspection, study and morality The theory system of introspection has become the ideological sour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elf-examination consciousnes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lthough the self-examin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Confucians is simple and unsystematic, it show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musical sense and humanity as a whole. The self-examin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Confucians is a watershed to divide the gentleman and the villain. It is an important rule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himself. It opens up the tradition of self-examination of Confucians, and provide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urrent moral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contemporary self-examina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the Pre-Qin period; Confucianism; self-reflection consciousness; private morality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杜成斌,张　骥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关键词:积极舆论;舆论环境;治理;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D6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20)01-0062-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0.01.007

舆论管控和引导是国家治理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的舆论一般表明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良好状况,掌控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也往往体现着一个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政府历来就重视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通过进行传统主流媒体的融合、互联网治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工程,提升了网络和信息安全,提高了国际话语权,彰显了文化自信,增强了人民精神力量。这一系列工作和举措统一团结了全党全社会思想,巩固壮大了主流思想舆论,为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积极舆论的内涵

舆论是公众对一定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表达出来的具有相对一致性的信念、态度、意见、情绪等的总和。它影响着有关事态的发展,包含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

收稿日期:2019-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18BKS149);河北省教育厅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当前我国社会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CXZZBS2019065);河北新型智库长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杜成斌(1990—),男,河北阳原人,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新型智库长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

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29亿,普及率达59.6%;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1]。人们的成长和发展会受各种舆论的影响。不同领域的舆论相互渗透,结为有机整体,形成一定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舆论环境。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一是指舆论传播的社会环境,二是指舆论的共生状态"[2]。舆论环境纷繁复杂,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根据舆论范围可以划分为国内的、国际的等;根据舆论群体可以划分为农民的、公务员的、青少年的等;根据性质和产生的不同社会效果可以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健康的、恶劣的等。

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积极舆论的支撑。所谓积极舆论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社会问题或者某一事件出现时,有些舆论可以促使该问题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或能够为该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合理可行的措施或良策。公众根据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评价,从而达到对自身和他人行为的支持或约束。积极舆论反映着公众在社会价值、利益方面的共同期望和追求,因此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同。积极舆论既包括宣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正能量的舆论,也包括依法监督政府、社会,发现社会问题,促使社会问题有效解决的舆论。引导公众发现社会问题、允许公众发表不同的意见和表达对不良现象的不满,既符合群众监督社会的原则,也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意,增加工作的动力和责任感。与积极舆论相对的是消极舆论。消极舆论是指当出现特定社会问题或事件时,一些舆论有意无意地以偏概全、曲解事实、误导大众,不仅不能帮助解决问题、提供合理建议,甚至还推波助澜,阻碍事件或者问题的妥善解决,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一般来说,理性的舆论成为积极舆论的可能性非常大,而非理性的舆论成为消极舆论的可能性极高。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

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理智与情感并存的动物,人的思维和意见也是理智与情感并存。人们对社会现象的了解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是十分清楚正确的。公众由于认识不足或受到误导,形成的舆论威胁到了其他个体、群体的正当利益,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违背了社会正确的价值观甚至法律,就会成为消极舆论。消极舆论始终伴随着积极舆论并对公众的认知产生干扰。所以,一旦当前舆论出现了消极势头,就需要及时的管控和引导。现实社会中的舆论是非常复杂的,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或者事件,不可能只有一种完全一致的观点,在同一时间往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舆论,这些舆论可能和谐互补,也可能相互矛盾或者呈对立状态。这就从侧面反映了社会舆论具有两面性,既包含好的或者理想的社会意识,也包含不好和不理想的社会意识。只有发展理性、健康的社会舆论,抵制消除非理智和不健康的社会舆论,才能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从而营造出积极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二、新时期积极舆论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构成了新闻舆论的四大生产力要素"[3]。"'四力'的主体并非只是新闻媒体,政府机构部门及有关单位在相当程度上同样是主体"[4]。传播力指的是传播主体凭借自身的业务水平以及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传播经验,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将需要传播的内容准确地传达给受众,从而实现有效传播的能力。引导力指的是主流媒体引导受众朝着其期望发展的方向思考、选择、发言乃至行动的能力,其本质是舆论引导能力。影响力是指主流媒体通过对受众宣传一定的内容,引起舆论广泛

关注，产生反响，最后作用于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能力。公信力是指主流媒体及政府部门在长期的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履行职责等实践活动中尽职尽责、公正透明，从而赢得广大群众满意和信任的能力。公信力能够反映出主流媒体及政府部门在社会当中的权威性和号召力。

主流媒体传播力的关键在于传播的广度和精确度。主流媒体的引导力在于对舆论进行有效的引领。主流媒体影响力的程度基于新闻舆论传播力的大小。如果传播通道不畅通、传播目的不到位，就不会对目标产生预期的正面影响力。公信力的核心在于“信”。提升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一方面在于主流媒体自身能力建设，依靠对新闻事实的真实、准确、及时、客观、公正的报道来熔铸，另一方面要提防和处理消极言论对主流媒体发声的篡改和抵制。积极的舆论环境可以确保主流声音在传播的过程中保持通畅，不受阻碍，实现传播的有效覆盖。积极的舆论环境由于普遍提高了公众对新闻事实的理解力和辨识力，可以使公众自愿被积极的事情影响，乐于被正能量引导。在积极的舆论环境中，积极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能够最大限度抵消消极舆论对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干扰，从而促进新闻舆论工作的正常健康开展。

(二)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

舆论环境治理属于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既需要强大的正向舆论引导，又需要持续的舆论环境治理。舆论环境是否良好体现了一个社会的综合治理水平。有效的舆论环境治理可以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社会秩序，推进法治与道德建设。舆论环境既反映了以各种舆论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也反映了公众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在交流当中持续互动的状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互联网舆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产生了复杂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社会舆论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们进入了信息过剩时代，人们对有用和正确信息的鉴别更加困难；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给网络诚信带来挑战，网络水军绑架社会舆论、煽动网民情绪，网络诈骗引发信任危机等已经成为构建网络诚信的症结；网络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模糊容易造成公民基本权利被侵犯；网络的匿名性容易使群体心理上的成见、偏见转化成舆论暴力和舆论审判。总之，互联网舆论环境乌烟瘴气不利于广大网民的健康发展，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所以，新形势下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要进行舆论环境治理。

(三)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舆论不等同于意识形态[5]，但和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影响。舆论是社会自在的精神形态，而意识形态属于政治范畴，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主流思想。一般来说，舆论导向的目的是使舆论符合当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习近平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6]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借助互联网，散播消极言论，妄图推动控制中国社会舆情的走向，破坏中国社会团结。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开放性、虚拟性、隐蔽性、互动性等特点，公众在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接受、交换和发布信息。网络既可以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先进文化，也可以传播各种错误思潮和消极舆论，而消极舆论的长期存在势必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认同造成挑战。苏联剧变之后，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绝对经济、技术优势，通过升级舆论传播模式、争夺舆论传播平台、建立舆论传播链条和干扰主流舆论导向，不断对中国输出西式民主观、普世价值、宗教极端思想，冲击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这些新情况使得当前中国的舆论环境治理难度增大，意识形态工作任务愈加艰巨。我们只有在建设积极舆论环境中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宣传思想工作，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舆论斗争，牢牢占领网上舆论阵地，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巩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三、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国内消极因素污染中国舆论环境

当前国内污染舆论环境的主要消极因素有谣言、历史虚无主义、消极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软暴力。这几种消极因素混杂在一起，影响着舆论的走向，对中国当前积极舆论建设造成了很大困扰。

1. 谣言蛊惑人心。谣言是脱离客观事实故意捏造出来并通过多种手段传播的消极言论。谣言内容可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多方面领域，传播速度迅速、范围广泛，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破坏性。由于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处于未经权威证实的状态，所以往往能迷惑很大一部分公众。没有被及时识破和制止的谣言甚至还会被公众当作“真相”来对待。造谣者为了骗取点击量和关注度，抓住重点对象，炒作社会热点问题，从而满足私欲和牟取私利。造谣和传谣首先会对当事方造成极大伤害和困扰，其次会消解民众对社会、党和政府的信任，误导民众怀疑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引起社会恐慌、污染舆论环境。如食品安全谣言动摇人心，扰乱市场秩序；涉军涉警谣言污蔑丑化人民军队和警察形象。

2. 历史虚无主义干扰公众认知。一些人借助网络平台公开发表诋毁民族英雄、抹黑国家历史和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言论，消费国仇家恨。部分主播、网红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为博取眼球毫无底线，竟然恶搞红色经典作品和人物、戏唱国歌。一些作者和编剧在利益的驱使下，推出了一大堆消费历史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尤其是“抗日神剧”持续引发中国网友的关注与批评，将本应该起教育意义的题材拍成了搞笑剧、偶像剧、科幻片，误导了大批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抗战史的认知。以“抗日神剧”为代表的抗战作品，普遍缺乏必要的历史常识和严谨的史料考证，随意杜撰和臆断抗战细节，有意无意夸大或忽略史实，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罔顾历史真相，是亵渎英烈和解构历史的体现。影视剧创作可以有适当的想象，但我们反对“披着严肃历史的外衣而行低俗化、娱乐化之实”。这些类似的现象究其本质其实是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极大，它通过诡辩误导、模糊是非、歪曲抹黑、无中生有等手段，实现其对历史的“虚无”，实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其在当今的具体表现方式有：通过丑化英雄解构主流价值，消解民族精神；通过诋毁党的领袖否定党的优秀政治品格；通过否定革命抹黑中国革命对历史进步的贡献；通过美化反面人物从反面论证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不合理性；通过美化侵略妄图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历史翻案；通过用假设否定事实来否认中国道路；通过裁剪事实、歪曲历史真相来引起社会对民族历史的质疑；通过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中国的指导思想；通过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通过否定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成就来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习近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不择手段：抓住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造声势，在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当中隐藏自己的价值观，用学术研究包装其政治观点，利用网络平台传播其思想观念。需要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潮，不是学术思潮；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历史虚无主义企图消解整个中华民族的根基、彻底瓦解社会主义中国[8]。我们需要密切跟踪和分析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新特点，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其蔓延。

3. 消极社会情绪引发社会焦虑。网络具有隐蔽、自由、开放的特点，互联网既是大家发表见解、抒发感情、揭露腐败、监督权力的平台，也是公众宣泄社会情绪和发表错误言论的场所。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步

入深水区，人口流动不断加剧，职业变动更加频繁，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明显，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公众发泄对社会问题、对生活环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社会公共部门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但是，公众的社会情绪也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和敌对势力利用，制造社会混乱。如当前群众对贪污腐败极其痛恨，如果长期被意见领袖煽动仇恨，就会在舆论上造成公众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不满。对于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如闯红灯、围观等，一些自媒体动辄以"中国式""国民性""劣根性"等带有成见的标签式词汇形容和描述。不可否认，部分公民缺失应有的法律修养、道德素质和社会担当，一些不良社会现象也导致了公众的不满，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如果以偏概全，无限放大枝节部分，长此以往，不利于中国人文明形象的塑造和国家积极形象的构建，不利于公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4. 网络舆论软暴力挑战道德和法律秩序。网络暴力是网民在网络上通过过分的人肉搜索、道德谴责、人身攻击、传播谣言、娱乐恶搞等方式，对当事人造成一系列身心伤害及生活困惑的网络失范行为。网络暴力首先表现为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也可能发展成违法犯罪行为。网络暴力与现实暴力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一种"软暴力"，应受到舆论的监督和法律的管制。部分网民缺乏理性和政治意识，不顾是非，容易被别人误导和撺掇，随意转发与传播有害信息和不当言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当前一些低俗、恶俗、庸俗的言论还有着一定的市场，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言论会不时受到污蔑和围攻，如一些弘扬爱国爱党的言论经常被扣上"爱国贼""小红粉""极左"等带有侮辱性的帽子。这些有组织、有预谋的舆论暴力的目的就是让爱国者以及敢于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亮剑的人士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道德上被污名化，在生活中被孤立化和危险化。以上问题的存在表明，网络舆论软暴力不仅挑战着道德和法律秩序，甚至还威胁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亟需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治理，打造网络积极舆论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络暴力是由道德批判转化而成的。公众对社会不公事件、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批判对监督社会和促进当事者自我反思与改正错误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当道德批评转化为道德绑架甚至道德审判时，副作用就会显现，理性思考的声音就会被盖住。毫无顾忌地谩骂、肆意公开他人隐私，不仅挑战道德底线，而且涉嫌违反法律。因此，要正确引导公众态度，克制消极情绪，防止"朴素的正义"转变为"网络暴力"。

(二)国外势力对中国舆论、舆情的干涉从未停止

从外部来说，一些国家和势力通过信息媒介西化、分化、妖魔化中国的图谋从未停止。他们利用新兴媒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消解的方式愈加隐蔽。某些西方国家基于其硬实力的领先地位，利用在国际社会上先建立起来的话语权优势，在不同的国际场合通过各种途径制造针对中国的消极舆论。如在国家形象上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锐实力"等；在公民形象上，将中国人刻画成"愚昧迷信""奸诈邪恶""缺乏诚信""不守规矩"的恶劣形象。通过一系列歪曲抹黑中国的行为，妄图否认中国的社会制度、阻碍中国的正常建设和持续发展。

除了在国际社会散播和制造中国的消极言论，境外敌对势力还插手干涉中国境内的舆情。如今网络已经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价值观输出与和平演变的主要阵地，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程度日益加深。为了更好地隐蔽和有效地渗透，国外敌对势力在中国物色当地的"代言人"，不仅资助和栽培一批所谓的"公知"与"大V"，还收买网络写手和大量水军进入网络舆论场，致使一些反共反华、污蔑英烈、抹黑中国、"修正历史"、危害国家安全等的信息和文章大量地在网络平台扩散和传播，误导着公众的认识，破坏着社会共识。这些"代言人"常用的手段为：热衷于炒作热点事件和公众人物，利用热点敏感问题对中国重要部门和领域进行黑化和污名化；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把对抗权威和主流价值观标榜为"自由""解放"；逢中必反、逢美必捧，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西方的所有都是先进的；习惯于在评论中国时采